

# 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研究

——兼谈咸阳成任东汉墓出土金铜佛像\*

张利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助理研究员）

魏文斌（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文明格局多元一体。中国的佛教文明亦是如此。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逐渐融入中华文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众多各具特色的佛教中心，佛教艺术也因之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自发端之日就遵循了分区域研究的路径<sup>[1]</sup>，最著名的例子是宿白提出的“凉州模式”“云冈模式”<sup>[2]</sup>。位于凉州和平城之间的关陇地区不仅是连接十六国北魏时期这两大佛教中心的枢纽，其本身也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sup>[3]</sup>。不同于凉州和平城规模较大的佛教石窟寺遗存，关陇地区北魏中期（439~493年）以前的佛教遗存较为有限，且以单体造像为主，其中很重要的一类是便于藏匿和携带的小型金铜

造像。从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来看，至迟从十六国起，关陇地区就产生了制造和供奉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的传统。比如《高僧传》中就有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分别向道安和慧远赠送金像的记载<sup>[4]</sup>，陕西长安县黄良乡、甘肃泾川县玉都乡等地都出土了十六国时期的小型禅定金铜佛像<sup>[5]</sup>。

但遗憾的是，目前对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及以前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的研究并不充分，现有成果或是对造像材料的简单整理与公布<sup>[6]</sup>，或是对某一件、某一类造像的专门讨论<sup>[7]</sup>，深入系统的研究亟待进行，且许多造像材料仍有待进一步披露。2017年4月，笔者在甘肃东部庆阳、平凉等地的多个博物馆中发现了不少尚未被学界熟知的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此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犍陀罗与中国文明交流史（多卷本）”（项目批准号：20&ZD220）阶段性成果，得到“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编号：GZC20252406）资助。



图一 镇原县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



图二 天水市博物馆1号禅定金铜佛像

外,2021年5月咸阳成任村一座被盗的东汉墓中出土了2件小型金铜佛像<sup>⑧</sup>,引起了学界对关陇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早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的重新审视和广泛争论。因此,本文拟在进一步补充甘肃东部相关造像材料的基础上,对关陇地区北魏中期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进行整体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成任东汉墓出土

金铜佛像的相关问题。

#### 一 甘肃东部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遗存

据笔者调查,甘肃东部地区的博物馆中至少收藏有10件北魏中期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分别是清水县博物馆、灵台县博物馆、静宁县博物馆、泾川县博物馆、镇原县博物

图三 天水市博物馆 2 号禅定金铜佛像



图四 泾川县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



馆各 1 件,天水市博物馆 2 件,庆阳市博物馆 3 件。

#### 1. 镇原县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

这 10 件造像中,学界仅对镇原县城关镇路坡村征集的禅定金铜佛像做过专门研究<sup>①</sup>。该像通高 10、背屏最宽处 6 厘米,主尊着覆肩袒右式佛衣,禅定坐于双足短榻式佛座上,两侧各立一肋侍菩萨像,铸于背屏下缘。背屏为莲瓣形,正面中央为重瓣莲花纹头光,其外铸九身小坐佛,

环以一圈带状莲瓣形背光,外缘为平行放射状火焰纹。背屏背面图像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为圆拱形龕内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和两侧的二菩萨、二飞天像;中层为院落前殿内并坐一排的八身小佛像;上层为院落中央的一坐佛四肋侍菩萨像和其左右、后部房屋(图一)。

#### 2. 天水市博物馆 1、2 号禅定金铜佛像

天水市博物馆所藏的 2 件佛像中有一件与上述佛像几乎一致,该像通高 10.7 厘米,其背



图五 庆阳市博物馆1号  
禅定金铜佛像



图六 庆阳市博物馆2号  
禅定金铜佛像

屏顶部向外有一块长条形凸起，原来可能连接有其他构件(图二)。另一件略有不同，通高9.3厘米，仅在正面造像，主尊身材比例更加瘦长，周围为五身小坐佛(图三)<sup>[10]</sup>。

### 3. 泾川县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

泾川县博物馆也收藏有1件类似的佛像，

通高10厘米，重125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征集于泾川太平乡一座寺庙中。该像锈蚀严重，细节特征模糊不清，主体部分的形制、题材组合与镇原城关镇征集像一致，差异主要表现为背屏顶部延伸出三块长条形凸起，分别连接两身禅定坐佛像和一只头朝右侧的立鸟，三者平

图七 庆阳市博物馆3号  
禅定金铜佛像



图八 清水县博物馆太和  
八年张陵保造像



行分布,立鸟居中,两身坐佛具桃尖形头光,造像特征与主尊相近(图四)。

其余6件造像与上述4件在题材组合和造像特征方面有较明显的差异。

#### 4. 庆阳市博物馆1号禅定金铜佛像

庆阳市西峰区征集,保存完整,略有锈蚀,通高21.8厘米<sup>[4]</sup>。主尊为禅定坐佛像,面相丰圆,略带微笑,鼻翼宽平,硕耳垂肩,螺发,球形



图九

灵台县博物馆片状九佛造像

肉髻。着通肩式宽领袈裟,衣领正中扭结,衣纹以细密隆线刻出,在胸前呈圆转V形对称平行排布,袖摆对称,平覆两膝,边缘饰连珠纹,两腿间衣纹横向平行分布,施掌心朝上的禅定印。背屏为莲瓣形。正面中央为素面椭圆形连珠纹轮廓头光,环绕主尊和头光,环以连珠纹轮廓身光,内以细密波状线作底纹。叠压在身光上方,铸刻七身小坐佛,其形象、袈裟与主尊相仿。小坐佛背屏为桃尖形,边缘饰平行放射状火焰纹。背屏最外圈为火焰纹,边缘饰一周连珠纹。背屏背面上方铸刻圆拱形龕,龕楣为尾部相交的双龙,龙首下垂,为侧面像,带角,吐长舌,龙身饰连珠纹。龕下为一排三身与正

面一样的小坐佛。其下双菩萨正面并排站立,扭头对视,内侧腿迈向对方,扭腰顶胯。右侧菩萨立双掌于胸前,两掌之间似捧莲蕾。左侧菩萨左手抚胸,右手平置腰间。双菩萨皆具圆形头光,束高髻,面相丰圆,五官模糊,上衣模糊不清,帔帛从身后前绕大臂内侧穿入,垂至地面,饰褶带纹,下着长裙。右侧菩萨胸前可见X状璎珞。龕周为细密波状火焰纹。

束腰四足佛座,四面开平直壶门。佛座上层正面上缘刻水波纹,两侧面刻连珠纹。中层束腰正面和两侧面刻菱格纹,部分菱格内刻圆圈纹。佛座下层仅装饰正面,上沿刻波状忍冬纹,下接内带圆圈的三角垂帐纹,两足分别刻

图一〇 静宁县博物馆  
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图一一 日本私人藏禅定  
金铜佛像



胡服男女供养人像。女供养人着裙，胸前袖手。男供养人着裤，执长茎莲蕾(图五)。

#### 5. 庆阳市博物馆2号禅定金铜佛像

庆阳市西峰区显圣乡唐苟村征集，佛座束腰以下不存，残高14.5厘米，此像与上述1号像属同一类型，在整体形制和各部分的图像构成与布局方面基本一致，仅在一些图像学细节上有所差别。为避繁冗，仅述其异者。

主尊额间现白毫相，纵向线刻发纹，着袒右式佛衣，右襟搭于右肩沿右臂下垂，内着菱格纹僧祇支，两腿间衣纹呈“八”字形分布。背

屏正面圆形头光内铸刻重层莲瓣，身光内无底纹，铸刻七身小坐佛，背屏外圈火焰纹形式简化。背屏背面图像清晰，拱形龕内上有三尊坐佛，下有二菩萨，龕楣两端刻菱格纹。二菩萨上身赤裸，敷搭帔帛，下着裙，外侧手中皆持长茎莲蕾，内侧手皆抚于胸前。龕外光素无纹。佛座正面上沿刻连珠纹，束腰处刻内带圆圈的方格纹(图六)。

#### 6. 庆阳市博物馆3号禅定金铜佛像

庆阳市西峰区征集，保存完好，通高10.5、背光最宽处5.8厘米。铸造粗糙，未见公开著



图一二 日本出光美术馆  
禅定金铜佛像

录。主尊面相长圆，磨光发髻，五官模糊，着袒右式佛衣，样式与镇原、天水等地的禅定坐佛像一致。背屏正面中部为圆形头光，内饰莲瓣纹，头光正上方铸刻一身禅定小坐佛，坐佛两侧各胁侍一只口衔花叶的立鸟。素面束腰双足佛座，束腰以下基座前后两面开平直高壶门(图七)。

#### 7. 清水县博物馆太和八年张陵保造像

保存完好，通高 21 厘米<sup>[2]</sup>。主尊为禅定坐佛，覆钵状肉髻，底发和肉髻正中刻旋涡状细密发纹。面相、袈裟样式、手印、头光与庆阳市博物馆 2 号金铜佛像大体一致。莲瓣形背屏，正面亦以带状连珠纹圈出头光、身光和背屏轮廓，身光内不铸七佛，身光外为减地火焰纹，饰以细密阴刻线。背屏背面上端阴线刻汉式屋形龕，其下刻二菩萨像，线条简练，皆具头光，长发披肩，束高髻，宽肩细腰，上身赤裸，敷搭帔帛，帔帛于体侧自然下垂，下着裙。二菩萨均外侧手臂自然下垂，内侧手臂半举，执一粗茎莲蒂，二莲茎于空中交叉后倒垂，呈圆拱形罩于二菩萨头顶。低矮方形佛座，前后两面开平直窄壶门，正面刻内带圆圈的菱格纹，其余三面

刻铭文，自右侧面始，录文如下(图八)：

太和八年(484年)四月]廿七日清信  
仕]张陵保造]铜像一区为七]世父母胎生  
父]母上生]天上值]遇弥勒下生人]间□  
□上□□

#### 8. 灵台县博物馆片状九佛造像

灵台县西屯乡征集，保存完好<sup>[3]</sup>。通高 18.5、宽 12.6 厘米。通体合铸，佛像数量从上至下按“一、三、三、二”排列，边缘上下相邻两佛以 C 形双龙首衔纽连接，除最下方两佛外，其余各佛之间镂空。

九身佛像形象相同，面相长圆，略带微笑，纵向线刻发纹，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重层覆莲佛座上，手部细节不明，着通肩宽领袈裟，衣纹细密，在胸前呈 U 形平行排布，袖摆对称，平覆两膝，两腿间衣纹横向平行分布。袈裟的样式、衣纹与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主尊和背屏小佛像高度一致。桃尖形背屏，背屏下端结束于佛像肘部，正面亦以连珠纹圈出椭圆形头光、身光轮廓，其中最下方右侧佛像头光外缘连珠纹较明显，部分身光连珠纹简化成弦纹，身光外为平行放射状火焰纹(图九)。

### 9. 静宁县博物馆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1984年静宁县李店乡王沟村出土,锈蚀严重,基座左侧略有缺失,通高11.4、宽6.5厘米,未见公开著录。菩萨交脚坐于双足短榻式基座上,双手交叠置于胸前作转法轮印,两肘与两膝同宽。面容清瘦,五官模糊,发髻呈束帛状,帛从身后前绕由肘部穿出,沿身体两侧垂下,服饰锈蚀不清。背屏主体为莲瓣形,正面中部为圆形头光,饰莲瓣纹;向外以连珠纹圈出身光、背屏轮廓,身光内铸刻7身小坐佛,身光外为火焰纹。背屏上方有扁袂状“光云”<sup>[14]</sup>,其内铸刻二飞天托举香炉。背屏背面为素面(图一〇)。

## 二 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的“关陇系统”

以上是甘肃东部地区现存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的基本情况,其中已经述及各造像之间的共同特征。关陇地区的西安、固原、咸阳也曾出土与上述近似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早已为学界所熟知。例如,西安莲湖区(西安博物院1号禅定金铜佛像)<sup>[15]</sup>和固原彭阳县新集乡(宁夏固原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sup>[16]</sup>分别于1972年和1981年出土了1件与镇原县博物馆佛像相同的禅定坐佛像。2021年5月,咸阳成任村M3015出土了1件片状五佛造像。1980年,西安莲湖区出土了1件带有“大代太和七年(483年)”“追远寺众僧”等铭文的佛板造像(西安博物院“大代太和七年”佛板造像)<sup>[17]</sup>。此外,1973年西安莲湖区还出土了1件类似于静宁县博物馆藏的交脚弥勒菩萨像(西安博物院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sup>[18]</sup>。除了上述出土、征集地点较为明确的造像外,还有许多与之极为相似的小型金铜造像流散海外,可以作为重要的补充材料进行讨论。根据这些造像的形制、题材、组

合和体量等因素,至少可以将它们分为莲瓣形背屏禅定坐佛像、片状多佛造像、佛板造像和交脚弥勒菩萨像四类。

### 1. 莲瓣形背屏禅定坐佛像

莲瓣形背屏禅定坐佛像是四类造像中现存数量最多的一类,这类造像在具体的图像特征上又有所变化,根据佛像与佛座样式、题材组合和装饰纹样可以细分为A、B两组较为典型的造像(表一)。

#### (1) A组造像

A组造像有庆阳市博物馆1、2号金铜佛像,共同特征是主尊面相丰圆、螺髻;背屏正面题材为七佛,背面为三佛和二立菩萨组合;四足束腰佛座;常见双龙首圆拱龕、菱格纹、圆圈



图一三 西安博物院“大代永兴三年”石造像

纹和带状连珠纹。

(2)B组造像

B组造像来源地点明确的有6件,以镇原县博物馆佛像为代表,其余为天水市博物馆2

件、泾川县博物馆1件、宁夏固原博物馆1件、西安博物院1件。此外,还有来源不明的3件,包括武威市博物馆1件<sup>[19]</sup>、美国弗利尔美术馆1件<sup>[20]</sup>和日本私人收藏1件(图一一)<sup>[21]</sup>。其共同

表一 北魏中期关陇地区莲瓣形背屏禅定坐佛像统计表

名称	造像来源	尺寸(厘米)	资料来源	备注
A组				
庆阳市博物馆1号禅定金铜佛像	庆阳西峰区征集	通高21.8	《甘肃省志·文物志(远古—2010)》(中册)(以下简称《甘肃省志》),第1436页	图五
庆阳市博物馆2号禅定金铜佛像	庆阳西峰区显圣乡唐苟村征集	残高14.5	笔者调查	图六
B组				
镇原县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	镇原县城关镇路坡村征集	通高10.1、宽6.2	《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图一
天水市博物馆1号禅定金铜佛像	1984年原天水市文化馆移交	通高10.7	《佛影灵奇——十六国至五代佛教金铜造像》,第74页	背屏顶部有长条形凸起,图二
天水市博物馆2号禅定金铜佛像	1984年原天水市文化馆移交	通高9.3	《佛影灵奇——十六国至五代佛教金铜造像》,第75页	背屏正面为五佛组合,图三
宁夏固原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	1981年固原县(今彭阳县)新集乡出土	通高14、宽7	《固原历史文物》,第141、142页	
西安博物院1号禅定金铜佛像	1972年西安莲湖区市建三公司出土	通高10	《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第4页	
泾川县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泾川太平乡征集	通高10	《泾川佛教瑰宝》,第204页	背屏上方连接二坐佛一立鸟,图四
武威市博物馆	不明	通高10.5	《武威文物精品图集》,第128页	
弗利尔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	1911年弗利尔于北京购藏	通高10、宽6.3	《金石之躯寓慈悲——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中国佛教雕塑》(著录篇),第26页	
日本私人藏禅定金铜佛像	不明	通高11.4	《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以下简称《图鉴》),第412页	背屏上方连接一坐佛二立鸟,图一一
B组演变				
上海博物馆禅定金铜佛像	不明	通高15	《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58a	
日本出光美术馆禅定金铜佛像	不明	通高14.8	《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56a、b	图一二
日本私人藏禅定金铜佛像	不明	通高10.4	《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54c、d	
A、B过渡组				
庆阳市博物馆3号禅定金铜佛像	庆阳西峰区征集	通高10.5	笔者调查	图七
清水县博物馆太和八年张陵保造像	天水市清水县出土	通高21	《甘肃省志》,第1436页	图八
西安博物院2号禅定金铜佛像	1972年西安莲湖区市建三公司出土	通高10.9	《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第7页	图一四

图一四 西安博物院 2 号  
禅定金铜佛像



特征是主尊面相长圆，磨光或竖线纹发髻，皆着覆肩袒右式佛衣；两侧背屏上各胁侍一立菩萨；背屏正面题材为九佛，背面为一佛四（二）菩萨、八佛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组合；双足短榻式佛座；常见重层莲瓣纹头光、屋形龕、带状连珠纹和平行放射状火焰纹；且通高都约为 10 厘米。

### (3) B 组演变造像

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图一二)和日本私人藏家的造像<sup>[22]</sup>在 B 组图像学特征上发生了一些演变,如造像变得瘦长、主尊的二胁侍菩萨消失、佛座前立面上缘加宽等。最显著的变化是主尊着衣纹密集的交领式袈裟,这种袈裟的样式和表现手法都明显受到了北魏晚期关中地区流行的石雕造像影响<sup>[23]</sup>。1972 年西安莲湖区出土了 1 件“大代永兴三年”纪年<sup>[24]</sup>的石造像(西安博物院“大代永兴三年”石造像,图一三),其背屏背面雕有与 B 组造像背屏背面相同的图式<sup>[25]</sup>,造像风格则与上述变化后

的风格近似,应该是 B 组造像样式的延续。整体来看,B 组造像数量很多,曾在关陇地区长期流行。

### (4) A、B 组过渡造像

庆阳市博物馆 3 号像、清水县博物馆张陵保造像和西安莲湖区出土的另 1 件束腰座禅定坐佛像(西安博物院 2 号禅定金铜佛像,图一四)呈现出较多过渡性特征,是连接 A、B 两组造像的中间样本。

庆阳市博物馆 3 号像与 1、2 号像皆征集于西峰区,属同一地区的产物,一脉相承。该像的佛座整体上延续了 A 组造像束腰须弥座加基座的形式,但基座部分变为双足短榻式,明显是结合了 A、B 两组造像佛座的特点,表现为过渡形态。图像组合方面,主尊与背屏正面“化佛+双鸟”的组合无论是题材还是构图形式都与 B 组日本私人藏禅定金铜佛像完全一致,该像的小坐佛和双鸟独立于主尊背屏之外,以长条形凸起连铸于背屏正上方。这种在背屏上方

表二

北魏中期关陇地区片状多佛造像统计表

名称	造像来源	尺寸(厘米)	资料来源	备注
灵台县博物馆片状九佛造像	灵台县西屯乡征集	通高18.5、宽12.6, 单尊佛像高约4.9	《甘肃省志》,第1437页	九佛组合,图九
故宫博物院片状多佛造像	20世纪60年代购藏	残高6.7,单尊佛像高约4.9	《中国金铜佛》,第24页	残留二佛一飞天像
咸阳成任村M3015出土片状五佛造像	2021年5月咸阳成任村M3015出土	通高15.8、宽6.4, 单尊佛像高约4.9	《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1期	五佛组合,图二五

加铸其他造像的做法在B组造像中较为普遍,在天水市博物馆藏1号禅定金铜佛像和泾川县博物馆藏禅定金铜佛像上都有体现,尤其是后者保存完整,同为坐佛与立鸟的组合,只不过数量和位置略有不同。主尊的造像样式也与B组造像的主尊一致。通过这件造像可以看到,

A、B两组造像是前后相继、连续发展的一个造像系统,且A组造像要早于B组造像。

清水县博物馆张陵保造像的主尊面相丰满,鼻翼宽平,保持着A组造像的特征。背屏背面的双菩萨立像延续了A组造像的题材,但屋形龕则普遍出现在B组造像中。佛座前

立面刻有A组造像中普遍流行的带圆圈的菱格纹,形制为前后开两个壶门的双足矮座,一方面摆脱了A组造像束腰四足座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尚未发展成B组造像的双足短榻式座,具有明显的过渡形态。袈裟样式也处在A、B组之间。该像有北魏太和八年(484年)的纪年,为判断A、B两组造像的年代界限提供了相对可靠的依据。

西安博物院2号禅定金铜佛像面相丰满,背屏上为波状火焰纹,显示出A组造像的特征。袈裟样式则与B组造像一致。佛座也是束腰须弥座与双足座结合的过渡形式,其下半部分为类似张陵保造像佛座的双足座。

A组造像中,庆阳市博物馆1号像早于2号像,二者之间的主要演变是:主尊佛衣由通肩式变为覆肩袒右式,头光中央出现重层莲瓣纹。这两项变化被过渡期和之后的B组造像所沿袭,成为它们的基本特征之一。此外,B组造像上普遍流行的平行放射状火焰纹在庆阳



图一五 日本私人藏无纪年佛板造像

市博物馆 1 号像化佛的背屏上就已出现; A 组造像普遍流行的菱格纹在 B 组西安博物院 1 号禅定佛像背屏上也有所保留。

## 2. 片状多佛造像

灵台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片状九佛造像实际上是九身背屏式禅定坐佛像的组合,但因造像形式特殊,单独列为一类。属于这类造像的还有故宫博物院藏片状多佛造像<sup>[26]</sup>、2021 年咸阳成任东汉墓出土的 1 件片状五佛造像,俟后文再议(表二)。这类造像上单尊佛像的样式和五佛、九佛的题材组合在关陇地区其他类金铜造像中较为普遍,并不特殊。

以片状九佛造像为例,在佛像样式上,其袈裟、背屏结合了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主尊和小坐佛的特点,面相和发髻则与 B 组禅定坐佛像相同。日本私人收藏的 1 件无纪年佛板造像上端两侧各铸一身形象与之相同的禅定坐佛像(图一五)<sup>[27]</sup>,大村西崖著《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中也收录了一尊与之相同的单体佛像<sup>[28]</sup>,再次说明这类造像并不罕见。

造像组合上,九佛组合还出现在 B 组禅定坐佛像的背屏正面,是 B 组造像的基本题材之一。尽管目前尚不明确九佛组合的佛经依据,但这种组合的造像实例非常丰富。普遍出现于云冈石窟佛龕和窟门的龕楣上,云冈二期石窟中除第 6、14 窟外其余洞窟皆有表现<sup>[29]</sup>。龙门石窟古阳洞的造像中也有少量表现<sup>[30]</sup>。泾川县水泉寺出土的张长等造交脚弥勒菩萨造像碑<sup>[31]</sup>的

龕楣上方也出现了九佛组合,与该碑题材、造像风格和雕刻技法方面非常一致的还有日本滨松市美术馆收藏的 1 件北魏晚期交脚弥勒菩萨石造像碑<sup>[32]</sup>,说明九佛组合在关陇地区也曾长期流行。

两侧连接佛像的 C 形双龙首衔纽还见于日本收藏的 2 件金铜佛板造像上,第一件是前面提到的日本私人藏无纪年佛板造像的底端与支座之间保存有两个完整的此类衔纽;第二件是北魏延兴四年(474 年)佛板造像,其上仅残留连接处的接茬(图一六)<sup>[33]</sup>。A 组造像背屏背面流行的双龙首龕也呈 C 形,可能也与之相关,至少能够说明双龙首在甘肃东部地区的盛行。此外,宁夏固原雷祖庙村北魏中期漆棺画墓出土的铜铺首衔环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双龙首图像<sup>[34]</sup>。龙的细部特征非常接近,比如口部、眼睛、耳朵、耳下鬃毛等,甚至身体上的线刻纹和连珠纹也几乎一致。总之,九佛造像的各种造像因素都曾在关陇地区普遍流行。

## 3. 佛板造像

佛板造像也是一类形制特殊的造像,除西安莲湖区出土的 1 件(西安博物院“大代太和七年”佛板造像,图一七)外,还有 4 件收藏在国外(表三)。其中,日本藏有 1 件太和七年(483 年)追远寺众僧等造佛板,其造像特征、尺寸、铭文等与西安博物院佛板造像几乎完全相同。李静杰、张聪等对这 5 件佛板造像做过专门研究,它们在图像组合、造像样式等方面都高度相近,应

表三 北魏中期关陇地区佛板造像统计表

名称	造像来源	尺寸(厘米)	资料来源	备注
西安博物院“大代太和七年”佛板造像	1980 年西安莲湖区出土	高 11.3、宽 10.8	《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第 8 页	背面有“大代太和七年”“追远思众僧”等铭文,下无支座,图一七
日本私人藏“太和七年”佛板造像	不明	高 11.3、宽 10.9	《图鉴》,第 400 页	背面有“大代太和七年”“追远思众僧”等铭文,下无支座
北魏和平元年佛板造像	不明	高 17、宽 12	《图鉴》,第 398 页	背面有“和平元年比丘法亮”等铭文,下有力士托举式支座,图一八
北魏延兴四年佛板造像	不明	高 16.8	《图鉴》,第 398 页	背面有“延兴四年”铭文,下有一柄二 C 形双龙首式支座,图一六
日本私人藏无纪年佛板造像	不明	高 16.2、宽 11.5	《图鉴》,第 399 页	无纪年,下有一柄二 C 形双龙首式支座,图一五

表四

北魏中期关陇地区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统计表

名称	造像来源	尺寸(厘米)	资料来源	备注
静宁县博物馆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1984年静宁县李店乡王沟村出土	通高11.4、宽6.5	笔者调查	下部为双足短榻式佛座,图一〇
西安博物院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1973年西安莲湖区出土	通高10.8	《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第11页	脚下为覆莲台,图二〇
日本私人藏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不明	通高12.2	《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84a	下部为双足短榻式佛座,图一九
日本私人藏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不明	通高12.2	《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84c	脚下为覆莲台,下连接倒喇叭形支座
美国纳尔逊博物馆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不明	高约8	《图鉴》,第408页	脚下为覆莲台

是同一地区的产物,一般认为流行于陕甘地区<sup>[5]</sup>。

尽管目前尚未在甘肃东部发现佛板造像,但佛板造像与甘肃东部的其他金铜佛造像有许多共同特征。首先,佛板造像主尊的背屏上

也装饰有北魏中期关陇地区小型金铜佛像上普遍流行的带状连珠纹;其次,佛板造像尤其是那件日本私人藏无纪年佛板造像与泾川出土的九佛造像有大量共同特征,业已阐明;

再次,佛板造像上立菩萨像胸前所佩X状珠串璎珞、长裙的样式和衣纹都与庆阳市博物馆1号像背屏上的菩萨像一致;最后,和平元年(460年)比丘法亮等造佛板造像(图一八)主尊背屏上的波状火焰纹也与庆阳市博物馆1号像背屏上的波状火焰纹一致。

#### 4. 交脚弥勒菩萨像

已知现存国内的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只有静宁和西安莲湖区(西安博物院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出土的2件,日本私人和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至少收藏有2件与西安像完全一致的此类造像<sup>[36]</sup>,应当也来自西安地区。此外,日本还有1件私人收藏的与静宁像更为接近的此类造像(表四)。该像背屏、底座和造像的样式与静宁像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其帔帛在胸前呈X状交叉,背屏外缘和光云上为放射状火焰纹(图一九)<sup>[37]</sup>。以西安像为代表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仰



图一六 北魏延兴四年佛板造像

莲台座上,背屏为桃尖形,背屏内无小坐佛和莲瓣纹头光,头冠与项饰华丽,帔帛有褶带纹,双膝宽于双肘(图二〇)。静宁像的光云图案和背屏火焰纹与之相同,但有所简化。三者相较,静宁像处于中间形态,说明此类造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流行演变。而这类造像所具有的带状连珠纹、双足短榻式基座和平行放射状火焰纹则显示了其与关陇地区其他类金铜佛教造像的联系。

除金铜材质外,庆阳合水县和西安还出土了石质单体交脚弥勒菩萨像<sup>[38]</sup>,陇东地区北魏中晚期的石窟寺和佛教造像碑、造像塔上也有大量这一题材的造像,不胜枚举。

放眼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北魏“文成复法”后,出现了小型金铜佛像大流行的状况。以平城、河北为中心,现存大量北魏中期的小型金铜佛像,主要题材包括说法系的立佛像和双狮座坐佛像、二佛并坐像、执莲手观音菩萨立像等。相较而言,关陇地区则普遍流行上述莲瓣形背屏禅定坐佛像、片状多佛造像、佛板造像、交脚弥勒菩萨像,与中原地区构成了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整体。这四类造像中除A组禅定坐佛像外,其余皆不见于其他地区,是关陇地区特有的造像形式。比如佛板造像、片状多佛造像、双足短榻式佛座、带状连珠纹和平行放射状火焰纹等都是关陇地区金铜佛像中独具特色的造像类型与特征。

在学术史脉络中,日本学者松原三郎曾提出北魏“甘陕样式”金铜佛像的概念<sup>[39]</sup>,李静杰也提出过北魏金铜佛像“关中区”的概念<sup>[40]</sup>。但由于当时造像材料不足等限制,



图一七 西安博物院“大代太和七年”佛板造像



图一八 北魏和平元年佛板造像



图一九 日本私人藏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相关论述不够充分。正如松原三郎所说：“将北魏5世纪的金铜佛所体现出的地域特色抽出来讨论是比较困难的。”“陕西派金铜佛到底有何特点目前还是个问题。”现在也许有足够的条件可以提出关陇地区在北魏中期形成了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系统——“关陇系统”。

### 三 “关陇系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的年代与文化源流

#### 1. B组禅定坐佛像年代

“关陇系统”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中,佛板

造像和清水县博物馆张陵保造像有明确纪年,能够为无纪年造像提供大致的年代界限。此外,还可以通过与其他相关纪年造像的类型学比较进一步推定无纪年造像的年代范围。其中B组禅定坐佛像和交脚弥勒菩萨像已有专门研究,二者的年代被推定为北魏太和年间,皆受云冈石窟直接影响,源头可以在炳灵寺石窟的西秦壁画中找到<sup>[41]</sup>。

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其著作中曾收录过1件B组禅定坐佛像拓片,年代标注为“天监二年(503年)”<sup>[42]</sup>。这一年代明显偏晚,且这类造像并非南朝金铜造像的传统,其年代可能是伪刻的,且该书所收萧梁金铜造像的纪年多有舛误,故不足为信。他还收录了1件太和二年(478年)比丘甘道可造观世音铜像,现藏故宫博物院<sup>[43]</sup>。该像为双足短榻式佛座,背屏上有重层莲瓣纹头光,带状连珠纹和平行放射状火焰纹,符合“关陇系统”金铜佛教造像的特征。这说明至少在太和初年双足短榻式佛座就已出现在金铜佛教造像上。日本藏太和十三年(489年)胡□□造金铜佛立像<sup>[44]</sup>也与B组禅定坐佛像有诸多相同之处,除了同

样的佛座、头光和火焰纹外,二者的背屏形状和袈裟左领的样式也完全一致,因此该像也可以作为B组像流行年代的重要参照。再结合处于A、B两组造像过渡阶段的太和八年(484年)张陵保造像以及具有相同图像组合的西安博物院“大代永兴三年”石造像。基本可以确定B组禅定坐佛像产生于北魏太和初期,一直延续到北魏末年。

#### 2. 佛板造像与片状多佛造像年代

佛板造像也有过专门研究<sup>[45]</sup>。5件佛板造像中只有一件没有纪年,而这件造像与灵台县博物馆片状九佛造像的关系又十分密切,能够为

推定片状九佛造像的年代提供相对可靠的依据。李静杰根据佛板形制的演变,认为无纪年佛板的年代早于延兴四年(474年)佛板,大概与和平元年(460年)佛板年代相仿<sup>[46]</sup>。故其年代在和平元年至延兴四年之间应无大谬,至少不会晚于佛板造像中纪年最晚的太和七年(483年)。又考虑到片状九佛造像结合了A、B两组禅定坐佛像的众多特征,其年代可能处于由无纪年佛板造像所推定年代范围的偏晚阶段。

### 3. A组禅定坐佛像年代

下面讨论三者之中最早的A组禅定坐佛像的年代,能够大致确定的是其年代应在太和初期以前。日本藏和平五年(464年)□姜造无量寿金铜佛像(图二一)<sup>[47]</sup>为推定A组造像中庆阳市博物馆1号像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二者有许多共同特征,具体表现为:第一,佛像、佛座、背屏皆连铸,束腰四足佛座的形态和各部分比例基本相同;第二,佛座正面在同样位置刻相同的波状忍冬纹,忍冬纹三叶一组,中间为波状藤蔓,两侧分别有一片和两片叶瓣,交替分布;第三,主尊皆着通肩袈裟,衣领、衣纹、衣摆的样式基本一致;第四,和平五年像背屏正面出现了带圆圈的菱格纹,背面佛像身光边缘装饰有带状连珠纹,最外缘为平行放射状火焰纹,这些元素同样出现在庆阳市博物馆1号像上。

这2件造像有如此多的相同点不是偶然性可以解释的,应是共时性带来的结果。而且庆阳市博物馆1号像也与和平元年(460年)佛板造像有诸多共同特征。综合考虑,可将庆阳市博物馆1号像的年代推定在和平五年(464年)前后。此外,还可以通过与更多纪年造像的比较研究来进一步推定A组造像的年代范围和文化源流。



图二〇 西安博物院金铜交脚弥勒菩萨像

我国早期小型金铜佛像中束腰四足佛座的年代特征十分明显,现存最早的此类佛座出现在南朝刘宋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像上,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国之造像延续了这种座式。庆阳市博物馆1号像与和平五年(464年)□姜造像的佛座也属于此类佛座的早期样式,其佛座束腰以下四足基座部分的高宽比约为4:5,与刘国之造像的基座比例非常接近。到太和初年,束腰四足座的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太和元年(477年)阳氏造像和比丘法恩造像为代表的说法系坐佛像<sup>[48]</sup>普遍流行束腰四足佛座,但其四足基座变得矮而宽,高度只有宽度的五分之三甚至一半,壶门降低,四足显得非常低矮。除此类造像外,太和以后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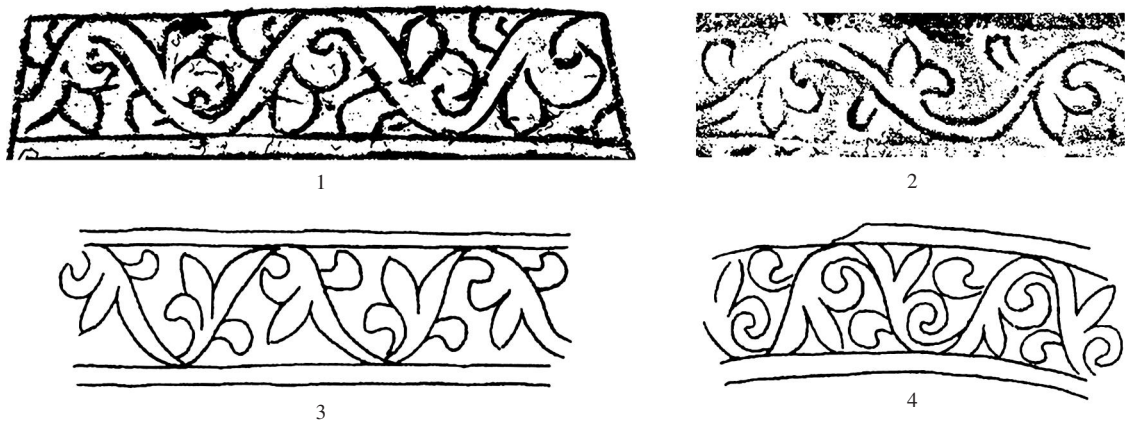


图二一 和平五年口姜造无量寿金铜佛像

腰四足佛座演变的总趋势是四足基座向窄而高的方向演变,壶门变得高而宽,四足细长,比如太和十七年(493年)赵僧安兄弟造像、景明二年(501年)普贵造像<sup>[49]</sup>等。

波状忍冬纹也是判定庆阳市博物馆1号像(图二二:1)年代和文化源流的重要因素。

大同全家湾北魏皇兴三年(469年)邢合姜石椁棺床的前挡板上雕刻有与之相同的忍冬纹<sup>[50]</sup>(图二二:2),李裕群根据墓主籍贯和壁画题材与技法推测该墓石椁壁画粉本可能来自长安地区<sup>[51]</sup>,作为石椁图像一部分的忍冬纹可能也与长安地区密切相关。此外,同样出自陕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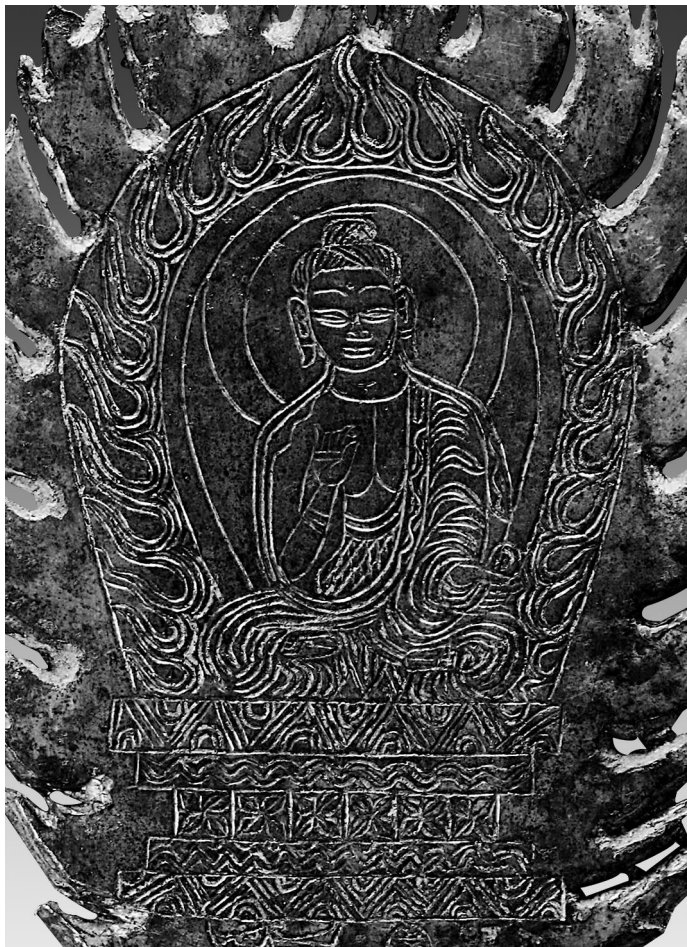


图二二 凉州、关陇、平城的波状忍冬纹样

- 1. 庆阳市博物馆1号像佛座
- 2. 皇兴三年邢合姜墓石椁
- 3. 承平元年神王浮雕佛座
- 4. 天梯山石窟第4窟

带的承平元年(452年)神王浮雕佛座壶门的上沿也雕有非常接近的忍冬纹(图二二:3),其忍冬纹的样式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天梯山石窟第4窟的北凉壁画中<sup>[52]</sup>(图二二:4)。上述4例忍冬纹出自陕甘或与陕甘地区密切相关,在具体样式上前后相继,前两例中连接叶片的藤蔓是由后两例中的一片长叶片演变而来的。而这种演变定型后的波状忍冬纹普遍出现在以太和元年(477年)阳氏造像为代表的说法系坐佛像的佛座上,在云冈石窟第二期中段的第9、10窟<sup>[53]</sup>中也普遍流行。这种波状忍冬纹在平城广泛流行的年代较晚,应该是从凉州经关陇地区传入的。

除忍冬纹外,A组禅定佛像中的许多装饰纹样都可以在关陇地区和西秦、北凉的佛教艺术中找到先例。佛座上刻水波纹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泾川玉都乡出土的十六国禅定坐佛像的基座上。背屏上装饰连珠纹的做法在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北凉壁画<sup>[54]</sup>和炳灵寺石窟169窟西秦造像<sup>[55]</sup>上大量出现。菱格纹不仅出现在西安所出十六国法卢文佛像的佛座上<sup>[56]</sup>,在北凉石塔上也非常流行,其中交脚弥勒菩萨的背屏上普遍装饰有菱格纹,高善穆塔、程段儿塔神王像的裙子上也装饰有菱格纹<sup>[57]</sup>。此外,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北壁中央所绘说法佛像的伞盖上也装饰有大量菱格纹,该窟四壁所绘的立佛像中还流行庆阳市博物馆2号像主尊所着的菱格纹僧祇支。菱格纹僧祇支还出现在缘禾(延和)三年(434年)白双且石塔<sup>[58]</sup>、酒泉残石塔<sup>[59]</sup>的禅定佛像和延兴五年(475年)张次戴造金铜立佛像背屏背面的佛像上。太和元年(477年)阳氏造像主尊、背屏背面坐佛像以及比丘法恩造像背屏背面坐佛像也着菱格纹僧祇支,应该也是受凉州和关陇佛教影响的结



图二三 延兴五年张次戴造金铜立佛像背屏背面佛像

果。其中,张次戴造立佛像(图二三)为推定庆阳市博物馆2号像的年代范围提供了重要依据,其束腰须弥座上还装饰有带圆圈的三角垂帐纹。

主尊的螺发是A组禅定坐佛像上非常特殊的因素。北魏中期螺发佛像似未普遍流行,现存数量极少,目前仅见于太安元年(455年)张永造像、太安三年(457年)宋德兴造像和延兴二年(472年)张伯和造像上。前两件造像据传发现于大同附近<sup>[60]</sup>,是平城佛教的产物。A组禅定坐佛像的螺发很可能是受到文成帝复法之初平城佛教的影响。此外,庆阳市博物馆1号像背屏背面菩萨帔帛上的褶带纹也明显受到云冈石窟一期造像的影响。在金铜造像中,同样的褶带纹还出现在皇兴四年(470年)王钟夫妻



图二四 咸阳成任村 M3015  
出土立佛像

造立菩萨像的帔帛下端,且该像胸前也有 X 状交叉的珠串璎珞。这再次为推定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的年代提供了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现存 A 组禅定坐佛像的年代与佛板造像的年代相当,其中庆阳市博物馆 1 号像的年代约在和平至皇兴年间(约 460~470 年),庆阳市博物馆 2 号像和片状九佛造像的年代约在孝文帝延兴至太和初期(约 471~480 年)。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 年)太武帝在长安下诏废佛,关陇佛教首当其冲。可以追溯到太武法难前的佛教遗存很少。2018 年,宝鸡郭家崖 M15 出土了 1 件较为完整的佛像摇钱树,包含 5 身树干佛像和 1 身树顶片状佛像<sup>[9]</sup>,将关陇地区最早金铜佛像的年代提前到东汉中晚期,但这还不是独立的佛教造像。关陇地区现存最早的独立金铜佛像是相传出土于三原县的金铜弥勒菩萨立像,具有浓郁的贵霜时期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年代可追溯到西晋晚期。十六国时期数

量略多的小型双狮座禅定金铜佛像<sup>[10]</sup>受到了河北地区同类造像的强烈影响,似乎还未形成关陇地区特有的风格。现存具有显著区域特征的“关陇系统”小型金铜佛像很可能始于“文成复法”后的北魏和平年间,与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开凿时间相当。其在沿袭本地佛教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北凉、西秦和北魏平城早期佛教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对“云冈模式”的形成和平城佛教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影响。以长安为中心的关陇地区自西晋以来就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竺法护、释道安、鸠摩罗什等高僧都曾在此译经弘法。北魏定都平城后,关陇地区成了连接凉州和平城两大佛教中心的枢纽,在推动北魏时期中国东西部地区佛教交流融合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 四 咸阳成任东汉墓出土金铜佛像相关问题

咸阳成任村 M3015 出土的 2 件小型金铜

图二五 咸阳成任村 M3015  
出土片状五佛造像



佛像分别是单体立佛像(图二四)和片状五佛造像(图二五),发掘者认为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可独立供养的金铜佛像,系本土制作,意义重大<sup>[63]</sup>。消息一经发布便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sup>[64]</sup>,该墓的发掘简报和2件造像的初步研究与科学分析结果也被迅速发表<sup>[65]</sup>。但由于出土佛像的墓葬本身并无纪年材料且被盗掘过,学界对这两件佛像的年代仍有争议。

目前对单体立佛像的讨论较多,集中在与犍陀罗、秣菟罗佛教艺术以及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比较研究上。实际上,这件佛像的外来风格并不显著,而且这种跨越大的时空范畴以及与不同材质造像的比较研究最多只能论证东汉晚期中国能够出现单体佛教造像的可能性,并不能作为判定这两件佛像确切年代与文化来源的可靠证据。

被讨论较少的片状五佛造像反而是解决相关问题的关键和突破点。虽然该像的五身佛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但将它们各自残留的

清晰部分拼合起来就能够大致复原出佛像的完整面貌。佛像面相长圆,施禅定印坐于桃尖形背光之前。右下方佛像右臂衣纹明显,可知其着通肩式袈裟。右上方佛像的袖摆完整,对称地平覆于双膝之上,此像背光左侧还保留有清晰的带状连珠纹。最上方佛像背光右侧也保留有带状连珠纹,背屏外缘保留有平行放射状火焰纹,佛像左膝下残存仰莲座的莲瓣。

可以看到,上述片状五佛造像的佛像特征普遍存在于关陇系统的小型金铜佛像中,尤其是与片状九佛造像的特征几乎一致。此外,在造像形式上,五佛造像与九佛造像都属于由小型禅定坐佛像构成的片状多佛组合,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造像题材上,类似于九佛组合出现在B组禅定佛像的背屏上,五佛组合也流行于关陇地区,且出现在B组天水市博物馆2号禅定佛像的背屏上。五佛造像在各个方面都符合关陇地区北魏中期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的特征,可以与灵台县博物馆九佛造像划为同一类造像,二者铸造和流行的年代相当,约在北

魏孝文帝初期。

在考古年代学上,佛像的埋葬年代一定晚于其铸造年代。这两件佛像在墓中相距很近,应是同一时期进入墓葬的。因此,片状五佛造像的年代能够说明这两件佛像进入墓葬的时间不会早于北魏孝文帝初期。成任家族墓中的M3019出土了东汉延熹元年(158年)的朱书陶罐,根据墓葬的排布次序,该墓可能会与M3015因墓主辈分不同而存在代际时间差,但从墓葬和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组合来看<sup>[66]</sup>,年代差距不会太远。M3015的年代无论如何也不会晚到北魏时期。这意味着M3015中的2件佛像并非墓主下葬时的随葬器物,而是后期混入的。发掘团队通过逻辑推理排除了盗墓者将佛像带入墓室的可能性,原因之一是佛像与盗洞不在同一位置,相距3.4米<sup>[67]</sup>。这一推理恐难服众,盗墓者既然已经将盗洞打进了墓室,就不太可能只停留在盗洞口。这两件造像尤其是五佛造像的膝盖、面部等凸出部位有明显的磨蚀痕迹并散发出金属光泽,甚至腿部衣纹已不明显,应当不是自然腐蚀所至,而是长期使用的结果。因此,这两件佛像可能是在铸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被带入墓室的,其具体时间则难以确知。

另一方面,尽管这两件佛像进入墓室的时间相同,但并不代表二者的铸造和流行时间也一样。比较这两件佛像的能谱成分分析数据,可以发现二者在铜(Cu)、锡(Sn)含量的占比上差别很大<sup>[68]</sup>。这至少可以说明它们不是同一批或同一时期铸造的。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同出佛像年代不同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镇原田园子石窟第3窟出土金铜佛像的年代从北魏太和年间到隋仁寿二年(602年)<sup>[69]</sup>,博兴龙华寺窖藏中金铜佛像的年代从十六国到隋代<sup>[70]</sup>。

从造像特征来看,片状五佛造像的年代应晚于立佛像。因此,前面所论的北魏孝文帝初期仍然可以作为这两件佛像进入墓室的年代上限。目前,笔者尚未在现存关陇地区的小型金铜佛像中发现与立佛像相近的造像因素。不少研究者引玛丽琳(Marylin Martin Rhie)书中收录的1件类似小型铜立佛像作比较,认为二

者有极高相似度,对成任墓立佛像的年代有重要参照意义<sup>[71]</sup>。诚如其言,但这件立佛像的来源地和流传状况不明,年代亦不明确,其本身尚有待研究,以之作为证据有很大的局限性。

- [1] 李玉珉《佛教美术区域研究之回顾与省思》,《艺术史研究》(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 [2] “凉州模式”代表了十六国晚期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地区的佛教艺术;“云冈模式”则是北魏统一中原北方地区不久后聚集全国技艺、人力和物力在首都平城形成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佛教艺术模式。见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宿白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区域模式论”,被学界普遍采用,来阐释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佛教艺术。此后学界还提出了“龙门模式”“长安模式”“秦州模式”“青州模式”“建康模式”“邺城模式”“高昌样式”等中国区域佛教模式。
- [3] 例如,宿白指出:“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即沮渠佛教兴隆之前,东方佛教盛行关中。”黄文昆认为:“西晋以后……在战乱纷扰的北方,佛教中心先后形成于河北、长安和凉州。十六国佛教美术始于后赵金铜佛系统,继而经过关中秦陇与河西凉州两个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北魏佛教美术走向兴盛的基础。”见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黄文昆《中国早期佛教美术考古泛议》,《敦煌研究》2015年第1期。
- [4]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第179页,中华书局,1992年。
- [5] 刘玉林《甘肃泾川县发现一批西秦窖藏文物》,《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Lin Meicun, A Kharosthī Inscription from Chang'an, 《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第197~208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韩保全《长安出土的佉卢文铭鎏金铜造像》,《收藏家》1998年第3期。
- [6] 翟春玲《西安出土北魏铜佛造像研究》,《文博》2003年第5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第2、5、7、8、11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于春《长安地区北魏佛教造像

- 的形制特征》，《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6期；于春《长安地区北朝金铜佛像形制与铸造技术特征》，《文博》2016年第3期。
- [7] 例如李静杰、张聪对佛板造像的研究，见李静杰《北魏金铜佛板图像所反映犍陀罗文化因素的东传》，《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5期；张聪《北魏铜铸佛板考论》，《美术学研究》（第5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 [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成任墓地东汉家族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1期；冉万里等《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1期。
- [9] 魏文斌、吴荃《甘肃镇原县博物馆藏北魏青铜造像及有关问题》，《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 [10] 浙江省博物馆《佛影灵奇——十六国至五代佛教金铜造像》，第74、75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 [11]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文物志（远古—2010）》（中册），第1436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 [12] 同[11]，第1436页。
- [13] 同[11]，第1437页。
- [14] 金申《甘肃合水县交脚菩萨像的形式来源》，《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
- [15] 翟春玲《西安出土北魏铜佛造像研究》，《文博》2003年第5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第5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于春《长安地区北魏佛教造像的形制特征》，《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6期；于春《长安地区北朝金铜佛像形制与铸造技术特征》，《文博》2016年第3期。
- [16] 固原县文物站《固原县新集公社出土一批北魏佛教造像》，《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 [17]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图版6、7，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 [18] 同[17]，图版10。
- [19] 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武威精品文物图集》，第128页，读者出版社，2019年。
- [20] 常青《金石之躯寓慈悲——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中国佛教雕塑》（著录篇），第26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 [21] [日]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编一），图版55c、d, 59a、b, 吉川弘文馆，1995年。
- [22] 同[21]，图版56、57、58a。
- [23] 对关中地区这类特殊样式的石雕造像的讨论，见[日]松原三郎《北魏陕西派石雕の一谱系》，《中国佛教雕刻史论》（文本编），吉川弘文馆，1995年；[日]斋藤龙一著、于春译《“郿县样式”造像的再检讨——关于陕西北朝佛道“平行多线纹”造像》，《文博》2017年第2期。
- [24] 根据造像风格，学界普遍认为“兴”为“熙”的误刻，将该纪年确定为北魏永熙三年（534年）。
- [25] 同[17]，图版23。
- [26] 李静杰《中国金铜佛》，第24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
- [27] 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第39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 [28] [日]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附图上），第192页，图版497，佛书刊行会图像部，大正四年（1915年）。
- [29] 相关造像的统计据张焯《云冈石窟全集》，青岛出版社，2018年。
- [30] 龙门文物保管所等《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图版154，文物出版社，1991年。
- [31] 同[11]，第1404、1405页。
- [32] 同[21]，图版185a。
- [33] 李静杰认为是莲茎，见李静杰《北魏金铜佛板图像所反映犍陀罗文化因素的东传》，《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5期。
- [34] 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6期。该墓的年代与云冈第9、10双窟的年代接近，约为太和十年（486年），见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第14、1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 [35] 同[7]。
- [36] 同[21]，图版84b、c。
- [37] 同[21]，图版84a。
- [38] 同[14]。
- [39] [日]松原三郎《中国初期金铜佛の一考察》，《中国佛教雕刻史论》（文本编），吉川弘文馆，1995年。译文见陈名译《中国早期金铜佛的一种考察》，《中国美术研究》2016年第1期。
- [40] 李静杰《早期金铜佛谱系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
- [41] 同[9]；同[14]。金申文中未提及普遍流行于北凉石塔上的交脚弥勒菩萨像，也未提及炳灵寺石窟169窟西秦壁画中的交脚弥勒菩萨像，两地应是关陇地区乃至平城地区交脚弥勒菩萨像的文化源头。
- [42] 同[28]，第155页，图版431。
- [43] 同[26]，图版22；同[28]，第159页，图版462。
- [44]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版51，文物出版社，1994年。

- [45] 同[7]。
- [46] 同[33]。
- [47] 同[21],图版 32。
- [48] 同[27],第 405、406、410 页。
- [49] 同[27],第 425、429 页。
- [50]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全家湾北魏邢合姜墓石椁调查简报》,《文物》2022 年第 1 期。
- [51] 李裕群《佛殿的象征——山西大同全家湾北魏佛教壁画石椁》,《文物》2022 年第 1 期。
- [52] 李裕群《神王浮雕石佛座拓本考释》,《文物》2010 年第 7 期。
- [53] 张焯《云冈石窟全集》(第七卷),第 52、53、134~139、168、169、220、221、224、225、268、269、296~323 页,青岛出版社,2018 年;张焯《云冈石窟全集》(第八卷),第 56、57、162、200、201、208、209、260~263、266、267、270、271、274、275 页,青岛出版社,2018 年。
- [54] 李甜《文殊山石窟研究》,第 158~162 页,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年。
- [55]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图版 11~13、21~24、29~34,文物出版社,1982 年。
- [56] 同[10],第 38 页。
- [57] 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第 35、37 页,台湾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 年。
- [58] 张宝玺《北凉石塔艺术》,第 77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年。
- [59] 同[58],第 81 页。
- [60] 金申《云冈石窟的佛像样式给与单尊佛像的影响》,《2005 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文物出版社,2006 年。
- [6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宝鸡郭家崖汉唐墓发掘简报》,《文博》2019 年第 2 期;崔峰《摇钱树佛像“梵天劝请”与丝绸之路传播》,《甘肃高师学报》2023 年第 1 期。
- [62] 现存共 5 件,包括 1979 年陕西长安县黄良乡出土的佉卢文禅定金铜佛像、1976 年泾川县玉都乡出土的禅定金铜佛像、甘肃省博物馆藏灵台县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禅定金铜佛像、天水市博物馆藏十六国禅定金铜佛像以及大夏胜光二年(429 年)施文造禅定金铜佛像(从铭文判断极可能产生于关陇地区)。
- [63] 《陕西咸阳出土国内最早金铜佛像》,《光明日报》2021 年 12 月 10 日。
- [64] 例如 2021 年 12 月 26 日四川师范大学艺术研究院主办了“咸阳新出土金铜佛像考古发现”的学术对谈。2022 年 2 月 25、26 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办了题为“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的工作坊,邀请了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香港中文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南加州大学以及泰国国立政法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和高校的相关学者进行研讨。工作坊的纪要发表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2 年 3 月 6、26 日版。姚崇新《关于咸阳成任东汉墓出土金铜佛像的几个问题》,《文博》2022 年第 2 期。
- [65] 同[8];李建西等《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科学分析》,《考古与文物》2022 年第 1 期。
- [6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成任墓地东汉家族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2 年第 1 期。
- [67] 同[66],第 26、27 页;冉万里等《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考古与文物》2022 年第 1 期。
- [68] 李建西等《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科学分析》,《考古与文物》2022 年第 1 期。
- [69] 同[10],第 38 页。
- [70] 张淑敏等《山东博兴铜佛像艺术》,第 154~159 页,文物出版社,2009 年。
- [71] 该像的详细信息见 Marylin Martin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 2, Brill, 2002, pp. 424-425, fig. 2.67. 相关研究见姚崇新《关于咸阳成任东汉墓出土金铜佛像的几个问题》,《文博》2022 年第 2 期;李雯雯、朱浒《咸阳成任墓地出土金铜佛像风格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22 年第 3 期;何志国《咸阳出土“东汉青铜佛像”献疑》,《中原文物》2023 年第 6 期。

(责任编辑:耿 昀)